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ISSN 1004-1710,CN 46-1012/C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作者：雷晓康，陈泽鹏
DOI：10.15886/j.cnki.hnus.202109.2211
收稿日期：2021-09-22
网络首发日期：2023-04-07
引用格式：雷晓康，陈泽鹏.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OL].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5886/j.cnki.hnus.202109.2211>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XXXX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雷晓康, 陈泽鹏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可借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挖掘社会融合在二者关系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对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融合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社会融合起完全中介作用。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融合是比互联网使用更加重要的因素。基于此,在理论层面,新时期社会治理理论应重视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有机统一,社会支持理论应强调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深度融合;在实践层面,一方面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智能技术使用困难,另一方面要丰富老年人的社会融合渠道,以此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社会融合;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5886/j.cnki.hmus.202109.2211

一、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1],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提升人民的精神富裕水平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阶段的重要任务,加快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从微观生命历程角度来看,机体衰老伴随感觉丧失、健康恶化、认知阻碍、情绪孤立、社交退缩等一系列问题易引发心理抑郁;就宏观社会变迁而言,老年生活长寿与孤寂并存,传统社交关系与情感支持的减少亦引发诸多心理健康隐患^[2]。因此,关爱老年人心理健康是我国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和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探究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实现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中,随着“全民网络时代”的到来,老年人也逐渐卷入到互联网浪潮中,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为25.8%,相较于2012年提升了19.6%,互联网持续向中高齡人群渗透。如今“上网”已经成为老年人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网络化”与“老龄化”的深度结合使得互联网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

此外,边燕杰认为人们幸福不幸福,社会融合是个重要的视角,个体越是融入社会,越能感到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其主观幸福感越高^[3]。因此,为进一步探明互联网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

【收稿日期】 2021-09-22

【基金项目】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MCA20200556);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重点智库研究项目(2021ZD1048);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23ZD07)

【作者简介】 雷晓康(1971-),男,陕西合阳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影响路径,本研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为数据来源,以互联网使用为自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社会融合为中介变量,构建起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经由社会融合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路径模型,为探索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路径提供一些新的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4],居民幸福感已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前,围绕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包括概念界定和影响因素探究两大部分: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作为幸福学创始人之一的美国心理学家埃德·迪纳的定义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个人生活质量进行的全面评估,是一个与满足感相关的概念,强调愉快的情感体验,包括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5]。我国学者邢占军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认为幸福感是人们基于自身满足感和安全感而产生的主观愉悦情绪,是由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三者组成的有机整体^[6]。具体到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来看,孙鹃娟认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以老年人生活的现实条件为基础,受老年人的思想、观念制约的一种感受,反映老年人的整体精神生活状况^[7]。关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自身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三方面:从自身因素来看,主要包括身体健康状况^[8]、希望、乐观等生活态度^[9];从家庭因素来看,子女数量、居住安排等代际支持程度^[10]发挥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因素来看,主要包括社会治理水平、环境治理水平等社会环境因素^[11]和人际关系、活动参与等社会网络因素^[12]。近年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日益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载体和方式,关乎人们的生活感受和生活质量,互联网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正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二)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关于互联网使用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持积极态度,如祝仲坤等的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会显著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13];冷凤彩等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研究显示居民使用互联网能令其幸福感提高14.1%^[14]。另一种持消极的态度,如Kraut等认为使用互联网与陌生人等“弱关系”的交流排挤了与家人等“强关系”的沟通,并因此增加人们的孤独感,甚至诱发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削弱主观幸福感^[15];Peng Nie等的研究也发现互联网使用与较低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16]。具体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来看,当前学者们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不足,仅有的研究普遍认为互联网对于老年人具有显著的幸福激励效应,如彭希哲等的实证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17],张振亭^[18]等学者的研究均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但是,来向武等的元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测量工具会对研究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19],而目前学者们对于“互联网使用”大多采用简单的“使用频率”或“是否使用”来测量,无法深入解释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生活方式的多功能性和强适应性,Jung等就表示在研究过程中不能盲目地认为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加来源于对时间使用的代替,应该超越仅测量使用时间的简单线性模式^[20]。

综上,为优化改进互联网使用测量工具,本研究以使用和满足理论为基础,运用互联网使用动机来进一步反映互联网的适用场景和需求满足。使用和满足理论认为从受众角度出发来看,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这些接触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求,会影响传播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21]。本研究借鉴Wellman对互联网使用动机的划分,即分为“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两种,非社会化的互联网使用为无需社会交往介入,单独个体可以完成的活动;社会化的互联网使用则是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社会交往。以此来考察老年人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动机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老年人通过和自身社交网络中的关系人或团体进行沟通互动可以得到物质和情感支持从而提升幸福感^[17],互联网的社会化使用打破了空间、距离的障碍,降低了老年人参与社交活动的成本,尤其对于出行不便的半失能老人或独居老人,极大地改善了其维系情感网络的条件,有助于

提升主观幸福感。此外,张伟的研究表明个体从外界获取的信息量也会影响个体的生活幸福感^[22],互联网的非社会化使用如阅读新闻资讯、阅读电子书籍、观看网络直播等均扩展了老年人信息获取的渠道,有利于增强老年人的信息意识,提升老年人的信息甄别能力,降低老年人受骗事件的发生概率,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a:互联网社会化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

假设 1b: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

(三)社会融合:作为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

黄匡时等将社会融合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会融合的宏观叙事,主要关注整个社会如何整合在一起以及如何避免社会解组、社会混乱和社会失范等问题;二是中观社会融合的族群模式,主要用来研究外来群体与流入地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三是微观社会融合的心理建构,主要从微观个体的心理层面研究社会融入和社会接纳^[23]。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层次,如对城市新移民、农民工、失地农民、流动儿童、随迁老人等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关注,而对第三层次的社会融合研究较少。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将从个体心理健康层面出发探究老年人的个体社会融合感知,主要包括老年人对群体或社会的认同和群体或社会对老年人的接纳两个方面。

1. 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融合

社会互动理论认为,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交流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有助于主体的社会融入,而传播技术是信息交流的重要媒介,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特的研究就表明传播技术具有社会融合的功能,传播可以作为一种人文关照,加快社会融合的速度^[24]。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战场,正在深刻改变着老年人的社会互动方式,进而影响其社会融合感知。Perkins等的研究证明老年人通过互联网不仅能有效增加他们与社会沟通、与照顾者接触的机会,而且能够保持和拓展他们的社会联系,从而避免社会隔离,促进社会融合^[25]。我国学者宋士杰等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互联网作为打破地理空间隔离、拓宽人际交往的渠道,具备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社会支持从而缓解老年人孤独感、促进社会接纳的潜能^[26]。

互联网的社会化使用提高了老年人社会互动的频率,丰富了信息交流的途径,扩大了其与社会的联系,有利于其在互动中发展对社会的认同,同时积极参与社会互动也有助于积累大量的社会资本,从而更易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接纳,增强其社会融合感知。互联网的非社会化使用帮助老年人及时了解社会中发生的热点时事,紧随时代的潮流,提升其参与社会互动的信心和能力,同时也培养其社会互动的兴趣,增加了被社会接纳的可能性,从而对社会融合感知产生积极的影响。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互联网社会化使用与老年人社会融合成正相关。

假设 2b: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与老年人社会融合成正相关。

2. 社会融合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个人只有得到社会群体有效和适度的认可、接受和容纳,实现了社会融合,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27]。Ward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积极的社会融合有助于缓解个体的负面情绪,提升主观幸福感^[28]。具体从社会融合心理建构的两个维度来看: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人们社会认同的首要动机就是为了维持高自尊,老年人对社会的认同程度会影响到其自尊水平,而已有研究表明自尊是主观幸福感的强烈预测因素^[29];社会接纳理论则强调“接纳”对个体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的积极效用,加强社会对老年人的接纳可以打破老年人与外界的隔离,强化老年人的身份认同感和个人价值感,让老年人感觉到需要和被需要,从而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综上,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社会融合程度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

综上,现有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社会融合感知、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存在两两相关的关系,社会融合在中间起中介作用,但从研究设计上来看,大部分学者将三者之间的关系割裂来研究,即只关注其中的一对关系,使得影响路径不够明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王辉等就提出现有研究大多只考察了媒介接触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需要对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展开进一步探讨,补充量化的证据^[30]。

为更加全面深入地阐释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结合上述讨论,本研究认为老年人的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均可以通过提升其社会融合感知,进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故而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a:社会融合对互联网社会化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假设 4b:社会融合对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综上,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设形成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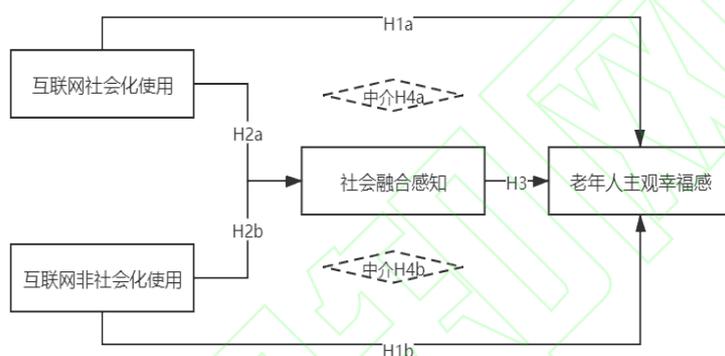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研究使用数据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项目 2017 年的调查数据,该数据采用多阶分层抽样的方法,地理范围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的省级行政单位,且该数据是目前国内罕见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个体互联网使用数据,因此对本研究来说,CGSS 2017 是一个合适的资料。本研究采用的问题均来自于 CGSS 2017 模块 C 部分,为保证数据质量和统计分析的准确性,剔除各题目含有缺失值的样本后,该模块得到全年龄段总样本 2430 份。此外,考虑到退休会使人们在一段较长的工作期内所形成的生活节奏、经济状况、身心状态、社会交往等都随之发生显著变化,且退休生活有可能导致出现烦躁不安、消沉抑郁等情绪^[31],结合我国平均退休年龄不足 55 岁的现状,本研究以“年龄 ≥ 55 ”为条件对样本进行筛选,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432 份。

在 432 份有效样本中,55-59 岁为 21 人,占比 4.86%;60-64 岁为 148 人,占比 34.26%;65-69 岁为 105 人,占比 24.31%;70-74 岁为 69 人,占比 15.97%;75-79 岁为 62 人,占比 14.35%;80-84 岁为 19 人,占比 4.4%;85 岁及以上为 8 人,占比 1.85%。从性别来看:男性为 230 人,占 53.2%;女性为 202 人,占 46.8%。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为 44 人,占 10.2%;初中为 154 人,占 35.6%;高中或中专为 154 人,占 35.6%;大专及以上为 80 人,占 18.5%。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为 343 人,占 79.4%;无配偶为 89 人,占 20.6%。从民族来看,汉族为 410 人,占 94.9%;少数民族为 22 人,占 5.1%。从政治面貌来看,党员为 123 人,占 28.5%;非党员为 309 人,占 71.5%。

(二)变量测量

为保证量表测度的一致性,本研究使用的所有题目均采用 5 分制李克特量表,且 Brown 认为可以将李克特 5 点量表视为定距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32]。

1. 因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根据Sapin等问卷设计者对该模块问卷题目的解释,个体主观幸福感主要从3方面来衡量:通过“在过去的四周中,感到不开心和沮丧的频率”(非常频繁=1,经常=2,有时=3,很少=4,从来没有=5)来反映个体的抑郁情绪;通过“在过去的四周中,感到困难堆积得越来越多以致您无法克服他们的频率”(非常频繁=1,经常=2,有时=3,很少=4,从来没有=5)来反映个体的压力感知;通过“总的来说,您对自己现在整体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无所谓满意不满意=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①来反映个体总体生活满意度^[33]。该量表融合了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两方面,更加契合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目标,相较于传统的“单题”直接测量,测量内容更加丰富且准确。

2. 自变量:互联网使用

对于互联网使用,通过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您因为下列事情而上网的频繁程度?(总是=5,经常=4,有时=3,很少=2,从不=1)”来测量。根据Wellman对互联网使用动机的划分,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包括:“社交活动(如:通过Email、QQ、微信、Skype等与人交流)”“自我展示(如:将微信朋友圈、QQ空间、微博等作为自我展示的平台,记录与分享自己的心情)”“商务交易(如:网上转账、支付、网购等)”。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包括:“休闲娱乐(如:游戏、音乐、视频等)”“获取信息(如:搜索信息、浏览新闻等)”。

3. 中介变量:社会融合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关注的社会融合主要指老年人心理层面对社会的认同或被社会接纳的感知程度,即心理感知上与他人的距离。CGSS 2017中对社会融合感知的测量包括3个题目:“在过去的四周里,感觉缺少陪伴的频率”“在过去的四周里,感觉被其他人孤立的频率”“在过去的四周里,感觉被冷落的频率”(很频繁=1,经常=2,有时=3,很少=4,从不=5)。

4. 控制变量

以过往研究为基础,本研究选取年龄、健康状况(很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很健康=5)、婚姻状况(无配偶=0,有配偶=1)作为控制变量。

(三)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信度方面,本研究中的四个主要变量互联网社会化使用、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Cronbach's α 值分别为0.666、0.659、0.877和0.773,均大于0.65,为可以接受的信度水准。根据Hair(2009)的建议,取每个变量所有题目的平均值来代表这一变量做后续的分析^[34]。在效度方面,本研究中4个因子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值分别为0.538、0.675、0.760和0.591,均大于0.5,并且所有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0.6,表示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此外,4个变量AVE值的平方根的最小值为0.733,均远大于所有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表明这些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表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信度、效度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信度	收敛效度	区别效度			
			Cronbach's α	AVE	1	2	3	4
互联网社会化使用	3.102	1.089	0.666	0.538	0.733	-	-	-
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	2.500	0.931	0.659	0.675	0.526**	0.822	-	-
社会融合	4.417	0.773	0.877	0.760	0.138**	0.160**	0.872	-
主观幸福感	4.027	0.690	0.773	0.591	0.137**	0.112*	0.569**	0.769

注:**表示 $p<0.01$ *表示 $p<0.05$ (双尾检验)。对角线数字为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对角线以下的数据为变量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① 原问卷中该题项为7点尺度量表,为保证量表的测量尺度一致性,本研究使用SPSS官网提供的方法,将7点尺度转化为了5点尺度,进行后续分析。

(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同一数据源,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本研究运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将四个维度的全部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 22.02%,小于 40%,可以认为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35]。

四、分析结果

为了检验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社会融合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社会融合三组直接效应,社会融合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本研究使用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Hayes 认为连续抽出放回的 Bootstrap 方法相较于 Sobel 检验和 Baron&Kenny 的因果步骤法对中介效应检验更具优势^[36]。

具体操作如下:在 SPSS25.0 中使用 Process 插件 V3.3 版,选用 Model 4(单纯的中介模型),分别以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为自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社会融合为中介变量,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为控制变量,置信区间设定为 95%,进行 5000 次重复抽样,检验结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其中表 2 为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表 3 为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直接效应来看,互联网社会化使用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beta=0.035$),但是置信区间 $CI=[-0.042, 0.112]$ 包含 0,且 $p>0.05$,影响效果不显著,假设 1a 没有得到支持。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beta=0.063$),但是置信区间 $CI=[-0.014, 0.141]$ 包含 0,且 $p>0.05$,影响效果不显著,假设 1b 没有得到支持。互联网社会化使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融合($\beta=0.157$,置信区间 $CI=[0.067, 0.246]$ 不包含 0,且 $p<0.01$),假设 2a 获得支持。社会融合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beta=0.504$,置信区间 $CI=[0.424, 0.585]$ 不包含 0,且 $p<0.001$),假设 3 获得支持。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融合($\beta=0.108$,置信区间 $CI=[0.017, 0.200]$ 不包含 0,且 $p<0.05$),假设 2b 获得支持。社会融合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beta=0.503$,置信区间 $CI=[0.424, 0.583]$ 不包含 0,且 $p<0.001$),假设 3 亦获得支持。

从中介效应来看,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通过社会融合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beta=0.079$,置信区间 $CI=[0.038, 0.125]$ 不包含 0,且 $p<0.01$)和显著的正向总效应($\beta=0.114$,置信区间 $CI=[0.026, 0.203]$ 不包含 0,且 $p<0.05$),结合假设 1a 的上述结论(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可知,社会融合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4a 得到验证。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通过社会融合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beta=0.055$,置信区间 $CI=[0.007, 0.113]$ 不包含 0,且 $p<0.05$)和显著的正向总效应($\beta=0.118$,置信区间 $CI=[0.028, 0.207]$ 不包含 0,且 $p<0.01$),结合假设 1b 的上述结论(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可知,社会融合在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4b 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方面,表 2 和表 3 中,均是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对社会融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婚姻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表 2 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n=432$)

类别		模型 1					
		社会融合(M)			主观幸福感(Y)		
		β	LLCI	ULCI	β	LLCI	ULCI
控制变量	年龄	0.108*	0.016	0.201	0.123**	0.044	0.201
	婚姻状况	0.209***	0.117	0.301	0.064	-0.016	0.144
	健康状况	0.197***	0.107	0.287	0.199***	0.121	0.277
自变量(X_1)	社会化使用	0.157**	0.067	0.246	0.035	-0.042	0.112

表2(续)

类别		模型1					
		社会融合(M)			主观幸福感(Y)		
		β	LLCI	ULCI	β	LLCI	ULCI
中介变量	社会融合				0.504***	0.424	0.585
	R^2	0.114			0.373		
	F值	13.674***			50.629***		
	间接效应(IE)				0.079**	0.038	0.125
	总效应(TE)				0.114*	0.026	0.203

表3 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n=432)

类别		模型2					
		社会融合(M)			主观幸福感(Y)		
		β	LLCI	ULCI	β	LLCI	ULCI
控制变量	年龄	0.105*	0.011	0.198	0.126**	0.048	0.205
	婚姻状况	0.195***	0.101	0.289	0.056	-0.024	0.136
	健康状况	0.196***	0.105	0.287	0.197***	0.120	0.275
自变量(X_2)	非社会化使用	0.108*	0.017	0.200	0.063	-0.014	0.141
中介变量	社会融合				0.503***	0.424	0.583
	R^2	0.101			0.376		
	F值	11.930***			51.196***		
	间接效应(IE)				0.055*	0.007	0.113
	总效应(TE)				0.118**	0.028	0.207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 (双尾检验)。 β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LLCI(Lower level confidence interval)表示置信区间的下限,ULCI(Upper level confidence interval)表示置信区间的上限。采用5000次重复抽样。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价值和创新点首先在于引入社会融合作为中介变量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拓展了社会融合感知在互联网情境中的应用,进一步明晰了影响路径;其次,运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来更深层次地反映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动机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超越了“互联网使用频率”的简单线性测量办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路径不显著。这一结论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如刘毅认为人们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是主观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因素,而社交媒体使用等外部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限^[37],何婷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38]。关于这一结论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深度”不足。当前老年人运用互联网主要是满足其生活最基本的通讯、娱乐需要,应用的场景较为单一,对于网络交友、网络游戏等高级功能不熟悉,互联网还未成为其“得心应手”的日常生活工具,所以并不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此外,老年人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不仅会体验到满足感,还会有挫败感,老年人互联网使用障碍现象还比较普遍,主要表现在打字、相关软件的具体操作等方面^[39],这一现象在高龄老年人群中尤为明显,这也会抵消一部分互联网的幸福效应。

2. 社会融合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首先,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均会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的社会融合感知,表明老年人不管出于

何种动机来使用互联网均可以增强其对社会的认同,同时也更容易被社会所接纳,这一原因主要在于互联网满足了老年人参与社会互动的需要,提升了社会参与的能力,削弱了社会排斥,对于消解老年人的孤独感、弥补参与信心的不足具有积极影响。其次,社会融合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Luo Lu的研究认为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多受人际及人与环境的关系所影响^[40],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这一论断,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讲,当前子女由于日常工作压力、通勤距离等原因导致对父母精神关怀缺位的现象较为普遍,而已有研究表明与子女见面越多、电话越多、感觉越亲近的能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抑郁水平均越低^[41],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的日益缺失进一步扩大了其对社会认同和社会接纳的需要,因此,社会融合感知对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主观福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社会融合是比互联网使用更加重要的因素。

3. 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57)大于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8)。此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个体单独完成的互联网活动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社会,但以人际互动为基本诉求的互联网活动更有利于拉近和他人的距离,对老年人社会融合感知的影响更直接,影响强度也更大。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融合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行动,是一个动态的行为过程,是主体与周围环境不断的持续性互动过程,并且与他人的行为相关^[42],而“互动”是互联网社会化使用的核心要素和原始动机。

(二)理论意义

1. 新时期社会治理理论应重视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有机统一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智慧城市治理、智慧社区治理等治理理念逐渐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热点讨论话题,然而目前多数研究者仅从治理的工具理性角度出发来探究如何开发新技术的治理场景、如何利用技术来提高治理效率等,而忽视了对治理的情感价值的考量,田先红等就认为长期以来,我们高度强调理性、制度和技术的的重要性,而“人”尤其是“人”的情感则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渐渐被隐没^[43]。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互联网技术,情感层面的社会融合感知对于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应当提高对治理情感价值的关注。回顾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历史,在传统公共行政时代,马克斯·韦伯认为发展成熟的科层制是在“无恨亦无爱”的原则下运作的,科层制发展越完美,越是“非人性化”,各级官员越要从职务处理中排除爱、憎等等一切纯个人的感情因素^[44]。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回归个体自由、尊重个体特性的趋势,情感作为个体差异性的集中表现也逐渐得到公共行政理论的重视,如裴宜理就认为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理性的和残余的意识被舍弃,相反,情感的姿态和表达方式,虽然来源于言说者,然而对于改变言说者,具有独一无二的力量^[45]。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理论应重视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统一,要在接纳现代科技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通过人文精神的指导和情感伦理价值的规制来使技术治理的手段性与社会治理的目的性达成一致,促进公共之善的实现^[46]。

2. 新时期社会支持理论应强调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深度融合

社会支持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社会支持是在一定社会网络中,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47]。社会支持理论的讨论重点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适时调整,以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为视角,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居民物质生活水平较低,居民的社会支持需要主要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等物质支持;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后,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我国居民的社会支持需要已经逐渐转向对社交需要、尊重需要等情感支持的层面。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当前,单纯依靠互联网技术这一物质支持无法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老年人同样需要社会认同、社会接纳等情感层面的支持。

因此,新时期社会支持理论应明确情感支持的类型、来源等,深入阐释新时期情感支持的应用价值、时代意涵和目标取向,厘清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各自的适用情境与支持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物质

支持与情感支持融合发展的培育机制与实现机制。

(三)实践启示

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得出以下几点实践启示:

1. 推动解决老年人智能技术使用困难,切实保障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过程中的各项合法权益。首先,要加强“老年友好型”软硬件开发升级,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供给。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听力、视力、敏捷性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现有的智能手机、手机APP等存在字体过小、操作繁琐等问题,导致老年人难以进行“深度使用”,因此应根据老年人的生理认知特点对互联网软硬件进行“适老化”改造,打破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壁垒,使老年人充分享受互联网的“福利”。其次,增强老年人的互联网意识,创新培训方式,开展老年人智能技术教育,发挥老年大学、养老服务机构、社区等主体的教育作用,如结合“基层社区创文工程”,推进社区科普工作,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定制个性化、多样化的培训课程,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互动性、趣味性培训活动。最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传统线下服务质量,改善老年人服务体验,发挥好兜底保障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引导老年人勇于尝试使用智能技术获取线上服务,在服务过程中逐渐增强其新技术使用自我效能感,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智能技术的便捷性,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2. 着力消除老年人的孤独感,丰富老年人的社会融合渠道。首先,要努力满足老年人的代际情感支持需要,重视营造“常回家看看”的社会氛围,引导子女定期为父母提供精神照顾和慰藉,通过家庭支持来帮助老年人融入社会。其次,要积极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创造条件,如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创办象棋、舞蹈、唱歌、乒乓球等各类兴趣协会;社区定期组织老年人集体郊游;引入“时间银行”模式来鼓励低龄老年人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等。再次,要不断完善退休返聘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薪酬福利制度、绩效考核制度等,以此来激励退休老年人积极发挥“余热”,一方面为社会、工作单位带来宝贵的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在“传帮带”的过程中可以增加与后辈年轻人的交流机会,有利于其自身的社会融入。最后,要帮助老年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开阔视野,提高其社会融合的能力。

通过以上方式,可以推动老年人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增强彼此间的互动,逐步消除自身的孤独感,发挥个人的价值,从而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有待改进:第一,我国存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有差异,本研究没有区分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忽视了城乡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数字鸿沟”现象,后续的研究可以关注互联网对于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异质性影响。第二,本研究对于互联网使用动机的测量不够全面,无法精准刻画我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特点,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对老年人的网络信息搜寻行为、网络社交活动、网络娱乐消遣行为等使用动机进行研究。第三,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将社会融合进行进一步挖掘为社会参与、社会认同、社会接纳等维度,更全面地探讨心理健康层面的社会融合在互联网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 [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2022-10-17(002).
- [2] 杨梦瑶,李知一,李黎明. 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基于两级数字不平等的视角[J]. 人口与发展,2022,28(06): 132-147.
- [3] 边燕杰,肖阳. 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4,29(02):22-42+242.
- [4]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10-19(002).
- [5] DIENER E D. 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4,95(3):542-575.
- [6] 邢占军.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1,25(01):196-219+245-246.
- [7] 孙鹃娟. 北京市老年人精神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08(03):308-310.
- [8] 詹婧,赵越. 身体健康状况、社区社会资本与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J]. 人口与经济,2018(03):67-80.
- [9] 牛玉柏,郝泽生,王任振,等. 老年人乐观、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控制策略的中介作用[J]. 心理发展与

- 教育,2019,35(02):227-235.
- [10] 王金水,许琪.居住安排、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的主观福祉[J].社会发展研究,2020,7(03):193-208+245.
- [11] 汪连杰.社会治理、环境治理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18(05):97-104.
- [12] 封铁英,刘蓉,高鑫.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养老机构调查实例的分析[J].中州学刊,2020(03):87-91.
- [13] 祝仲坤,冷晨昕.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来自CSS2013的经验证据[J].经济评论,2018(01):78-90.
- [14] 冷凤彩,曹锦清.互联网使用具有幸福效应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8,33(03):4-12.
- [15] ROBERT K,MOIRA B. Internet us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2015,58(12):94-100
- [16] PENG N,GALIT N,ALFONSO SOUSA-POZA. Erratum to: internet u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7,132(2):489-516.
- [17] 彭希哲,吕明阳,陆蒙华.使用互联网会让老年人感到更幸福吗?——来自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9(10):57-68.
- [18] 张振亭.城市老年人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以N市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10):141-147.
- [19] 来向武,任玉琛.中国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影响的元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06):21-38+126.
- [20] JUNGJOO-YOUNG. Internet connectedness and inequality[J].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01,28(4):507-535.
- [21] 曹钦,原辰辰.“使用与满足”理论文献综述[J].东南传播,2013(12):18-20.
- [22] 张伟.信息存量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CGSS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4):62-71.
- [23] 黄匡时,嘎日达.社会融合理论研究综述[J].新视野,2010(06):86-88.
- [24] 罗伯特·E·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M].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9.
- [25] PERKINSELIZABETH A,LAMARTINKIMBERLY M. The Internet as social support for older carers of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J].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2012,9(1):53-62.
- [26] 宋士杰,宋小康,赵宇翔,等.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人孤独感缓解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9(01):63-69.
- [27] 涂尔干.自杀论[M].冯韵文,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54.
- [28] COLLEEN W. Probing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adaptation: big questions, little answ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13,37(4):391-404.
- [29] HELEN C,ADRIAN F. Personality, self-esteem, and demographic predictions of happiness and depression[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3,34(6):921-942.
- [30] 王辉,金兼斌.媒介接触与主观幸福感——以政治信任为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J].新闻大学,2019(07):1-15+120.
- [31] 纪竞垚.我国老年人退休适应及影响因素研究[J].老龄科学研究,2016,4(03):71-80.
- [32] BROWN J D.Likert items and scales of measurement[J].Shiken: Jalt testing & evaluation sig newsletter,2011(15):10-14.
- [33] SAPIN M,DOMINIQUE J,CHRISTOF W. The ISSP 2017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resources modul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2020,50(1):1-25.
- [34] HAIR J F, BLACK W C,BABIN B J,et al.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7th ed.)[M].Prentice Hall,2009:124.
- [35] 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心理科学进展,2004(06):942-950.
- [36] HAYESANDREW F. Beyond Baron and Kenny: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in the new Millennium[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2009,76(4):408-420.
- [37] 刘毅.微信使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8):154-159.
- [38] 何婷.媒介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02):77+116.
- [39] 谢祥龙.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特点及其与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 [40] LUO L,ROBIN G. Culture and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individual oriented and social oriented swb[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4,5(3):269-291.
- [41] 冀云,孙鹃娟.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代际支持对抑郁的影响[J].宁夏社会科学,2018(06):152-160.
- [42] 陈成文,孙嘉悦.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41(06):66-71.

- [43] 田先红,张庆贺.城市社区中的情感治理:基础、机制及限度[J].探索,2019(06):160-172+2.
- [44] 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6-47.
- [45]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J].中国学术,2001(4):97-121.
- [46] 赵天梁,李萍.走向智慧治理——智能时代技术治理的人文伦理观照[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1):37-44.
- [47] 周林刚,冯建华.社会支持理论——一个文献的回顾[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5(03):11-14+20.

[责任编辑:张文光]

Promotion or Inhibiti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gration

LEI Xiao-kang, CHEN Ze-pe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CGSS 2017), we can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ternet use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nd explore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ocial and non-social use of the Internet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but the impact was not significant, and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Social integration plays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social use of the Internet, non-social u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For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social integration is a more important factor than Internet use. Based on thi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theor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organic unity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emotional value,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support should emphasiz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aterial support and emotional support; On the practical level,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focus on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us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for the elderly,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enrich the social integration channels for the elderly, so as to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 Internet us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social integration; mediating effect